

露天电影

□ 赵声仁

上, 腕坐树杈, 手攥树枝, 两眼盯着银幕, 还不时发出口号, 告诉人们, 他们在树上, 比小兵张嘎还勇敢。

放映员是相对固定的, 一般是两个人, 师傅带个徒弟。二骡子他爸长期接送放映员, 和他们早成了朋友。因了这层关系, 二骡子和我, 在位置的选择上, 就有了特权。我们两个长期在片子旁边, 和放映员在一起, 一边看着胶片转动, 一边看着银幕。师傅姓陈, 好开玩笑, 左腿有点跛。村里人都喊他陈瘸子。陈瘸子, 是电影《夺印》里的一个反派人物, 这部电影是他放映的, 大家自然把这个外号送给了他。他也乐得答应。每次他来, 我和二骡子就多拿个凳子, 给他坐。有时家做好吃的了, 我们还给他们拿过点来。陈瘸子在我们的心目中, 就如同《地道战》里的高老忠, 是英雄。没有他, 谁给我们放电影?

在片子旁久了, 我还生出了一个特殊的嗜好, 就是格外爱听片子放片时发出的喀嗒声。那声音, 均匀、清脆、大小适中, 听着, 心里就妥帖, 似乎觉得, 银幕上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 都是从这喀嗒声中产生的。喀嗒声里, 蕴涵着无穷的故事。无独有偶, 谍战片中, 女发报员发报时的滴滴声, 我也特别爱听。

陈瘸子的放映技术是一流的。片子打开后, 他两手把住盛放胶片的铁皮盒子摇柄, 左几下, 右几下, 好像随便摇摇, 片子就开始工作了, 喀嗒声, 连续响起, 屏幕上便出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个金色的大字, 接着, 放着光芒的五角星, 也閃动着映入眼帘,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在耳畔回响, 激越、洪亮。全场立时寂静, 我的心同时激荡起来。

电影放映过程中, 常有情况发生。有的片子放映次数太多, 老化严重, 就出现断片, 我们叫烧片。正是大家全神贯注之时, 屏幕一下子黑了, 场下往往一片唏嘘。陈瘸子不慌不忙, 三下两下, 就接好了片子, 重新放映起来。有时放映新片, 为了让大家尽快看到, 县里安排在同一晚上, 几个村轮流放映。大队上就安排专人提前到上一个村等着取片, 取回放毕, 又送下一个村。但时间并非完全同步, 有时需要等待。大家等着着急, 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起来。有的甚至出怪声, 吹口哨。大队就委托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维持秩序。当年, 这种情况叫跑片。最糟糕的是突然停电, 全场一片漆黑, 陈瘸子也急得咂嘴。村里的电工, 一般在放电影的时候, 值班配合。这时, 会马上查验。如果是村里的故障, 倒好排除。但更多是上边停的, 没有及时通知。大队书记就跑到队部, 抓住电话机生播, “喂”个不停, 直至找出原因。电话打不通, 就同时派出几路人马, 去公社, 去工委, 查找原因。大家就在盼望中等待, 没有几个人回家。

电影, 全是夜间放映。密密麻麻的一院子人, 进出便, 又有故事情节吸引, 人们也舍不得出来, 就有好多故事酿成。大多数的家庭, 晚饭都以稀粥为主, 两三个小

时的电影, 没有几个人能一气坚持下来而不小解的, 就有人在电影的声音之外, 听到断断续续的“哗哗”声, 有人脚下就有微热的感觉, 一种厕所才有的味道, 也袭入鼻孔。冬天天冷夜长, 这样的事情更多。要好的男女青年, 更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当然, 附近外村的居多。他们白天没空儿, 晚上没地儿, 这会儿, 天黑人杂, 他们往往找个墙角蹲下, 伺机而动。开始很平静, 当电影开演, 人们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银幕上之后, 他们便拉手摸肘, 勾肩搭背起来, 四只眼睛盯着屏幕, 两唇却碰到了一起, 心思早飞向了远方。坐在房上的人, 居高临下, 看在眼里, 走了心神, 就假装咳嗽, 或找树枝、小石头砸将下来。下边的二人身子一哆嗦, 赶紧逃向别处。

我们家乡那儿, 村庄特别密集, 近的相隔一里, 远的不过三里, 相互之间, 亲友也多, 哪个村有放电影的消息, 总是不胫而走。所以, 下外庄看电影, 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去外村看的电影, 甚至比本村还多。但去外村一般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不是距离很远, 看不好人像, 听不清对白, 就是在屏幕边沿底下, 看着人物、风景全部走形, 要不就跑到屏幕后边, 看反面, 分析着看。知道有新片, 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提前约好, 跟家里说说, 饿着肚子, 鱼贯进村, 找个好位置坐下来。鸡鸣鹤巢, 这村的大人倒没说什么, 但和我们同龄的小朋友们却欢歌于怀, 就往边上轰我们。以牙还牙, 他们来我们村, 占好地儿了, 我们也不管他们。一来二去, 两村孩子就有了隔阂, 擦上了劲儿, 你轰我撵, 相互谩骂, 有时在半路上堵截对方, 甚至大打出手。记得一年冬天, 我们村和瓦房村的小嘎子们较上了劲, 井水不犯河水, 谁也不能去对方村看电影。有电影, 就到村外堵截, 不回, 就用土块、石块乱砸。电影的诱惑太大了, 《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枪炮都不怕, 小小石块、土块, 焉能挡住我们学习英雄的决心?

家长们也都知道两村孩子为此打架斗殴, 就不让我们去, 说等和解了再说。但我们怕怕这些, 无知有勇。再说, 打石块、土块仗, 也正是我们的所爱。这天, 瓦房村演电影, 妈妈不叫三哥和我去, 眼睛盯着我们不让出屋。外边的伙伴们, 早吹口哨招呼我们。三哥我俩急得团团乱转。正无奈之时, 可巧生产队长来我家串门, 妈妈赶紧叫三哥把洗脚水泼到院子, 张罗给队长让烟倒水。三哥和我使了个眼神, 端起洗脚水就出了房门。水泼了, 盆子没有送回, 趁机归入小伙伴的隊伍, 抬着两兜事先准备好的石块、土块, 直奔瓦房村。这天格外黑, 相隔一二十米, 就前后不见人。我们靠声音招呼着, 摸索前进。谁也没有想到, 瓦房村的十几个嘎子, 已经在半路上截着我们; 谁谁也没有想到, 没等我们缓过神来, 他们的石块、土块, 就雨点般飞将过来; 尤其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还来不及反击, 三哥就歇斯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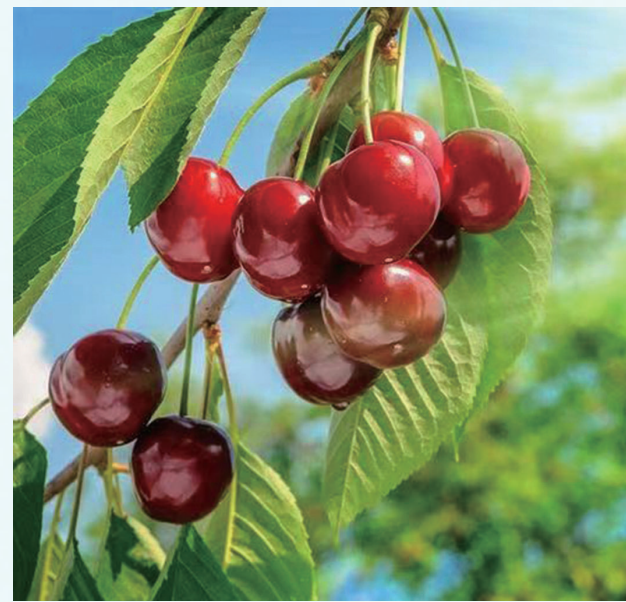
地大哭大闹起来: “哎呀, 妈呀, 我眼看看不见啥了, 瞎了!” 三哥是这帮人的头儿, 是最有力气打架的人, 也是扔石块、土块的高手。我们一枪未发, 领头的率先受伤, 大家士气全无, 更没了看电影的勇气, 一起扶着三哥回家来。半路上, 三哥仍哭个不停。

进屋一看, 三哥的右眼青红相间, 瘀血严重, 肿得和小馒头一般。眼睛, 早被挤成一条缝, 扒开, 果然看不见任何东西。队长还在我家, 和父母分析认定, 这是被一大土块所砸, 幸好不是石块, 要不非出个大口子不可。赤脚医生来了, 消毒止痛, 一番处置。当夜去唐山眼科医院, 拍片检查, 眼球组织尚好。但大夫说, 视力一定要下降。七八天后, 三哥眼睛消肿痊愈, 但视力由 1.5 下降至 1.0。直至现在也没有恢复。

追着看电影,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没人后悔, 更没有影响我们继续下外庄看电影。我们小孩子们的恶作剧, 很快就化解了。因为说到底, 就是想占个好位置, 看好一场电影。我们心照不宣, 和好如初。

电影, 大部分是战斗片, 我们叫打仗的。国产片居多, 也有几部进口片。一定是因为年龄小, 片子少, 看得遍数多, 那一二十部影片的名称、人物、情节等, 我记忆得如数家珍。特别是一些正反面人物的台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反复用, 用了几十年, 现在还在用。《南征北战》解放军师长在动员大会上的台词: “我们的两只脚, 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让我们在台下倍受鼓舞; 《平原游击队》中, 日寇队长松井一句“慌什么? 一个李向阳, 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从敌人口中, 反证了我八路军的神威。而《列宁在十月》中的“面包会有”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空气在颤抖, 仿佛天空在燃烧”等, 《地道战》里的“水是可宝贵的, 应该把它放回原处”, 《小兵张嘎》中“老子吃西瓜从来不掏钱”等等经典台词, 几乎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电影中, 找到形容的台词, 而且效果奇特。几个镜头, 更是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地雷战》中, 日军头目杜边, 戴着白手套, 扒拉地雷, 而扒出大粪, 放在鼻下闻手的镜头, 总是让我心头解恨, 忍俊不禁; 《奇袭白虎团》中, 二胡配乐, 站岗的美国鬼子抽白烟, 舒服地直伸懒腰的镜头, 更让我觉得滑稽可笑。《地道战》中那首著名的插曲《太阳出来照四方》, 我从邓玉华的首唱听起, 几十年里, 无论何人传唱, 我都百听不厌, 倍感温馨。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印度的《流浪者》等外国电影, 都让我耳目一新, 从不同角度, 领略了不同时代的人物命运和异域风情。

现在, 听说有好的电影, 我就在手机上买票, 去电影院看一场。总想找回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但找不到。



樱桃熟了

□ 范文军

在阳光的温情抚摸下, 迁西才庄的樱桃园热闹异常, 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这里已然迎来樱桃成熟的最为绚烂璀璨的时刻。踏入这片园子, 那熟透的樱桃恰似红宝石, 精巧地镶嵌在绿叶之间, 美得令人心醉神往。

人们望着满树红艳艳的樱桃, 眼中满是丰收的喜悦, 那笑容仿佛能融化整个世界。而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客人们, 也怀揣着无尽的期待, 如潮水般涌入这片樱桃的梦幻之境。他们带着对采摘的热切渴望, 踏入园子,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即将开启这场欢乐之旅的激动。

当客人们欢跃地攀爬上樱桃树, 他们的内心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所填满。他们的双手轻柔地抚摸着那圆润而可爱的樱桃, 如同触碰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樱桃摘下放入篮中, 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它们的珍视。他们在树上欢呼着, 心仿佛要跳出嗓子眼, 喜悦的情绪如浪潮般在心中翻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与这些甜美的樱桃。客人们还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下自己在树上采摘的欢乐瞬间, 或是在树下倚着一篮篮樱桃开心合影的画面, 然后迫不及待地发到朋友圈, 与朋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斜日庭前风袅袅, 碧油千片漏红珠。”我也轻轻摘下一颗樱桃, 放在手心, 它圆润而光滑, 那鲜艳欲滴的色泽仿佛在召唤着我品尝。放入口中, 轻轻一咬, 甜蜜的汁液瞬间在口腔中四溢开来, 那是一种至纯至浓的味道, 带着阳光的温暖与微风轻柔, 每一口都仿佛在诉说着樱桃成长的传奇故事, 从绽放花朵到结出果实, 历经风雨的磨砺, 最终迎来这甘甜的曼妙时刻。

凝望着这热热闹闹的场景, 我的思绪悠悠飘向远方, 似乎看到了那些曾经同样欢乐的采摘时光。岁月悠悠流转, 但这份甜蜜的记忆却永远地扎根在了心底。如今, 樱桃又一次成熟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在这里共同感受着这份快乐。

在樱桃树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身上, 形成一片片斑驳陆离的光影。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 似乎也在为樱桃的成熟而纵情欢呼。这片樱桃园, 不仅仅是迁西才庄的一道美丽风景, 更是承载着无数人对美好未来的精神寄托。

樱桃熟了, 生活也在这甜蜜中继续向前, 绽放出它独有的绚丽光彩。而樱桃园中的这一切, 都将成为我们心中温暖而珍贵的永恒回忆, 尤其是那上树采摘时心中的兴奋劲儿, 以及拍照发朋友圈的激动场景, 更是如璀璨星辰般闪耀在记忆的天空。

卖黄瓜

□ 艾立起

“卖黄瓜咧, 顶花带刺的嫩黄瓜!” 楼下的吆喝声引发我的兴致。见此情景,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卖黄瓜的往事。

1970年, 盖了新房后,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菜园。在一家人的细心经营下, 小园里各种蔬菜生机勃勃, 郁郁葱葱。青辣椒、红柿子、长豆角, 圆冬瓜……特别那两畦黄瓜秧, 上面疏密有致地挂着碧绿的黄瓜, 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但这些黄瓜家里人是不轻易吃的, 我们吃到的只是那些长“化”了、萎缩成半截的残次品, 能看过眼、拿得出手的则留着卖出去换个零花钱。成年人参加生产队劳动, 卖黄瓜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身上。

那天, 家里让我去卖黄瓜。这对我来说是赶鸭子上架,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这人天生就不是做买卖的料儿。果不其然, 我和弟弟挎上篮子, 每人带5斤黄瓜到邻村去卖, 弟弟卖得了一元, 我只收获了六角。原因之一是我心软。一个抱小孩子的妇女, 说孩子想吃黄瓜, 挑了两根随手给孩子吃, 可一摸身上没钱: “坏了, 我把钱丢了。黄瓜孩子咬了, 没法退, 下次一块儿算吧。” “嗯……好吧。” 我只能默许。二是我眼拙。见过几次面的人, 仍旧不敢确认。一个老太太卖了黄瓜, 从家取钱返回, 我没认出来。她递给我一角钱, 我又给她称了一份黄瓜。三是我性子急。黄瓜卖到一半儿, 来说: “大热的天, 降价吧, 早卖早点回家, 省得家里人牵挂!” 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我巴不得早点卖完, 早点解脱。于是, 把卖价由每斤2角调到1角5分。“剩下的都是别人不要的, 处理给我吧!” “中。” 这样, 单价又下降到了1角。

回到家里, 母亲见我卖的钱少, 也没有责怪。哥哥说我“不中用”, 我也没有反驳。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只是从此, 我就用此类事情“绝缘”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想起这段往事, 我觉得挺有趣。

我的小学生活

□ 沈庆

1976年, 我在滦河西岸的小贾庄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 小学还是五年制。

我所在的小村, 是唐山东部一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村落, 据说曾是商周遗址。处于懵懂的岁月, 我还不清楚“商周”这个概念, 只觉得其时间之长, 长过村东缓缓流淌的北不见头、南不见尾的潮水。

一间教室, 几套桌凳, 一块黑板, 一个板擦, 几根粉笔, 就是我们全部的教育教学设施。教室墙体是土坯的, 墙皮斑驳, 似老迈之人脸上赫然裸露的老年斑。桌凳都是长条的, 一套供三个同学使用。桌面漆黑, 间有窟窿。凳子是马凳样式, 两端有腿儿, 常常被我们晃悠得木楔松动。有时就夹了屁股, 痛得我们龇牙咧嘴。所以, 坐在上面的三个人, 总是挤呀挤, 都不想坐到楔子处, 挤得厉害了, 两个人合伙就把另一个人挤到地上, 有时便把马凳掀翻。但我们并不急眼, 也很少哭, 更不会找老师告状。当然, 这都是课下的事。课上, 我们会规规矩矩地倒背着手, 跟着老师读课文, 或低头算算术。搞小动作是常有的, 但看着老师拿着小棍儿板着脸走过来, 赶紧又规矩起来, 否则, 那小棍儿会毫不留情地落到捣蛋者的屁股上。

那年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村据唐山百八十里, 村里很多房屋也都倒塌了。而我们只有五个班级的小学校, 房屋本就似老太太皱巴巴的嘴——兜不住风, 一经颠簸, 坍塌了一地。学校没了, 但孩子们还得上学。建学校是需要时日的, 我们便被安排到村西“八家子”的土岗子上去上课。

土岗5米左右高, 为沙土岗。上面长有许多的杨树和槐树, 树木繁茂, 林荫浓郁, 在炎热的夏季是个难得的清凉之地。树上有许多蝉, “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树间空隙就是我们的“教室”——在一棵大树上钉一颗钉子, 把一块涂了墨水的硬纸壳挂在钉子上就是我们的“黑板”。每三人还是合用一张黑黢黢的长桌子和长木凳。老师在前面讲, 或在黑板上写, 我们就跟着念或写。朗朗的读书声和知了的鸣叫声合在一起, 成为苦难岁月里美妙的音乐。有时, 我们会趁老师写板书的时候, 彼此做个鬼脸, 或者, 仰头听着叫声寻蝉的影子。

下课的时光是最愉悦的。土岗西南三面是差不多的高度, 只在东面有一个坡。这个坡, 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滑沙场。起初是男孩子们滑个不停, 屁股往高岗上一坐, 膝盖弯曲, 一拱一拱的, 就出溜溜滑

下去了。后来, 我们女孩子们也被男孩子们推下去, 惊叫声、嘲笑声、雀跃声连成一片。最搞笑的, 是有人没滑好滚了下去, 弄得满头满脸满嘴满身的沙子, 样子像个沙猴子。再后来, 就有男生故意滚下去逗人发笑。

还有下课追着鸡跑的, 把鸡吓得咯咯乱叫, 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也有用树枝做玩具的, 有找蝉皮的, 有打弹弓子的, 有捉毛毛虫的, 有画“丁老头”的, 各种玩乐, 都沉浸其中。

大约一个月后, 我们从土岗上搬到了新搭建的简易土坯教室里上课, 老师依旧是一块黑板、三两本书、几支粉笔, 学生则是三两本书、一个算术本、一个田字格本、一根铅笔。三年级后, 多了一本作文本。

除了学习, 我们还要劳动。那时, 时兴勤工俭学。打草、捡麦穗、拾花生是每年必有活动, 我们排着队, 在老师的带领下, 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田间地头, 感觉颇兴奋。印象最深的, 是给庄稼撒农药。用布袋装好“六六粉”, 把布袋口抽紧, 拴到一根木棍上, 用左手拎着, 右手拿一根细棍, 顺着田垄, 用细棍敲打农药袋, 药粉便从布袋中喷出, 落到了蚜虫、肉虫的庄稼上, 同时

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那些虫儿们很快就“死悄悄”了。

做这些活, 虽脏、累, 但那时的人都很实诚, 没有偷懒的。偶有顽皮的, 也无怪乎捉只蚂蚱、青蛙之类。队长为了“犒劳”我们, 会在劳作的间隙为我们担来两桶“饮料”。那是用井里的凉水, 兑入醋和糖精合成的。我们排好队, 等轮到自己时, 拿起那个破了很多釉面的茶缸子, 舀一缸, 仰脖咕咚咕咚灌下, 又酸又甜, 好喝得很。喝完, 用手背抹抹嘴, 口中发出“啊”的一声, 算是回味。这样的糖精水, 在当时是我们最高级的“饮料”了。

一晃, 匆匆五年。我小学毕业了。

